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日文学经典的 传播与翻译（上）

王晓平 著



中華書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日文学经典的 传播与翻译（上）

王晓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王晓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10030 - 3

I. 中… II. 王… III. ①比较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日本
②文学 - 文化交流 - 中国、日本③文学翻译 - 对比研究 - 中国、日本 IV. ①I206②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532 号

书 名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全二册)

著 者 王晓平

丛 书 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 王 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79½ 插页 8 字数 10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030 - 3

定 价 234.00 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序

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有属于她的思想文化巨人，也需要她能够世代共享的经典。

一个时代的经济不论多么发达，如果没有时代文化巨匠和思想的代言人，说明这个时代的精神是贫瘠、空洞、苍白的，缺乏文化独创性的，至少是非多元的、民族精神有所欠缺的。

同样，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共享的经典，那么她的信仰、凝聚力、文明高度，就会暴露出诸多问题，至少是亟需提升的。

悠久的文明仅仅意味着经典资源的丰厚，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能为人所用，而这些资源只有经过反复翻译、不断重读与创造性开发，才会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

被称为日本“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的加藤周一（1919—2008），在《为活出希望的读书指南》一文中，曾向日本人推荐《论语》，在谈到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还有一些共通的古典，而在今天，对于日本人来说，《论语》早已不是共通的古典了，近代日本文化有点怪、有点蹊跷的事情，就是奉为古典的《论语》的缺失。他这里所说的古典，就是自古相传的文化经典。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了曾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的《论语》的缺失。他列举了西语圈包括《旧约》在内的《圣经》被广泛阅读的事实，从17世纪的莫里哀、笛卡尔等法国人共通的古典说起，警告说：“不具有共通的古典的社会，不也就近乎野蛮了吗？”^①

^①〔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説補講』，かもかわ出版2006年版，第238—239頁。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当今的文化巨匠和共通的经典，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将过去的一切清洗掉了，哪会有什么知识巨人？而没有知识巨人，那过往的古典也就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

本书作者怀着对中日两国文学经典的尊重，开始了对两国间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 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是人力与科技力的综合

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国际间的文学接受和影响无不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往而是社会思潮、文化需求、时尚趣味、名人效应乃至传播方式等多种因素、多重合力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文学的传播更与文学教育体系、新闻出版及各种媒体的参与和推动密不可分。总之，离开了对文化相关诸因素的研究，文学传播的很多疑点便找不到有力的答案。

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整体研究，就是采用文字学、语言学、翻译学和文艺学结合的方法，对中外文学经典在对方国家的传播和翻译作出描述，以便对两国通过以文学经典的互译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活动有一个全面整体认识，为进一步展开各种题材、各类作品的翻译介绍的个案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的文学经典在日本被传播和翻译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而中国传播和翻译日本文学经典的历史也已过百年，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丰富的文化纠葛和文学因缘，这本身是一个尚未很好总结、需要长期研究和讨论的学术领域，一部著述是不可能将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在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日渐深入的今天，历史需要总结，而当前面临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更需要面对。因而，笔者围绕日本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中的诸多理论问题、日本对中国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的个案研究，以及中国对日本文学经典翻译的主要问题，将全书分为三编，根据课题需要，回溯相关历史渊源，对准问题症结，分别加以讨论。即上编历时性探讨中日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涉及的多种要素和各类问题，中编对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研究和接受择要论述，下编则关注日本文学经典在中国翻译中一度较为普遍存在的“过度归化”与文字学修养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经典，是指那些权威、典范的伟大文学著作，是经过反复不断被阅读、被解释、被评价之后，其价值才被认定，并最终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经典的文学著作。以往的文学经典还会经受现代人的重读与检验。现代性的内核是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基于这种尊重而衍生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凡是盗用经典的名义而铸造思想牢笼的行为，其实都是与民族精神的精髓毫不相干的。经典教会我们不做权奴、钱奴，也不做物奴、思奴。经典滋养心灵，丰润人生，壮美民族。在经典面前，无需屈膝跪拜与献上廉价的赞辞，只需要与之展开诚挚的对话与沟通。

中国的文学经典是我们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它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过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都是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之一。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文学经典遭受形形色色怪论的焚毁与供奉、棒杀与捧杀、毒语的曲解与蜜语的误读，但经典依然是经典，而那些点火者、上供者、自唾者、织谎者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日之间通过人员、图书、教育等多种形态来传播彼此的经典，而图书是经典传播的最常态、最重要的方式。汉字是记录中华文明的直接工具，也是传播中华文明的直接工具，并且还曾经是日本人在文明曙光期以及相当长时期中记录生活状态和意识形态的直接工具。隋唐时代的遣唐使及其随员是中日之间的“带书者”，也是中国经典最早的传播者，由他们将经典的魅力扩散到皇族和贵族；以后，五山僧侣和江户儒者先后成为中国经典传播的中坚力量。明治维新之后，现代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逐渐形成，中日经典才开始了双向传播的历程。由于中国图书传入日本后得到了良好的再生产，中国典籍的传播才可能具有如此可观的规模。

还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经典只不过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史一体的传统、特有的文学范畴，都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传播的独有风景。这种传播不仅形成了中国文学翻译世间罕见的深度与广度，而且造就了日本自身的汉文化、汉文学体系，它们在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礼、以文为戏等诸方面，都与中国本土的汉文化、汉文学的文字血脉相通而又精神各异。

不妨将中国典籍的日本再生产，分成四个如下阶段来描述：

写本再生产传播时代。最早登陆日本的图书形态便是汉字写本（包括木简写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汉字写本是中日两国知识的共有载体，是文明积累和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据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现存日本各地的汉籍写本多达七百余通^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仅是汉籍（中国人著述）的写本，反映中国典籍传播而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写本文献还不包括在内。在刻本普及之后，写本作为一个时代宣告终结，但写本在文学传播中的功能仍在继续，因为在汉籍阅读者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得不到刊印机会的写本仍在门人、弟子、子孙、学友之间传播着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近代的文化发展中，写本仍然发挥着文人交往、启蒙教材、保存学者个人著述、美化文人日常生活等特殊作用。

刻本再生产传播时代。五山僧侣曾是中世传播汉文化最重要的担当者，五山版汉籍和五山文学成为中世文化的最亮点。文学的刻本传播时代在江户时期全面到来。京都、大阪、江户三城市连手的发行销售系统，书店兼顾出版发行和行商坐贾兼备的体制，质地优良的纸张等都为和刻本争得了荣耀。除日本保存的宋元版本之外，和刻本也保留了大量的中日文学传播的信息，还有待于学者们去开掘。文学刻本时代到来之后，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但并没有终结写本的功用。写本是和刻本的前身，也是和刻本的补充与后备军。

近现代机器印制传播时代。机器印制图书的出现，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也将两国文学长达千年以上的单向传播主潮迅速转换为广泛意义上的双向对流。明治初期乘江户汉学的余波，东京凤文馆印制大型图书《佩文韵府》《资治通鉴》等，也开现代出版商与学者携手推进大项目出版的先河^②。自大正年间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国译汉文大成》、早稻田大学出版会推出《物语支那史》以来，隔若干年，出版业便会与学界合作出版一些中国相关典籍的大型丛书，每一次出版便会出现一个中国典籍宣传阅读的小高潮。

计算机文明、网络再生产传播时代。这一时代为文学传播提出了崭新的

①〔日〕阿部隆一『本邦現存寫本類所在略目録』、『阿部隆一遺稿集』、汲古書院1993年版、第211—241頁。

②〔日〕ロバート・キャンベル「東京鳳文館の歳月」、中野三敏監修『江戸の出版』、ペリカン社、第174—232頁。

课题，国际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被提到增强国家软实力、关乎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得到从官方到民间广泛的参与。漫画、动画、影视、各类大众文化中都有中国文学经典被通俗化、时尚化、娱乐化乃至被恶搞的变体。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中国文学经典还靠其他途径来传播，如音声（如古代的朗咏、流传至今的诗吟等）、表演（如平安时代流觞曲水中的赛诗活动、中世谣曲中中国题材的剧目等）和图像（描绘入唐经历的绘卷、版本插图与现代动画）等。它们有时传播的不是中国文学经典的本身，而是日本化了的作品，但在扩大中国文学经典的声誉和影响方面具有独特的传播功效。

不难看出，文化与文学交流每一阶段的进展，既是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化结合的过程，也是其人力与科技力的合力作用。

本国或本民族被奉为经典的文学著作，其在本国本民族的经典地位，十分有利于它们的对外传播。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经典，都会在他国享有同样崇高的声誉和受到同等的推崇。文学经典作品在跨疆越土进入到他文化之后，就开始了自身命运的独特旅程。译者是使它们实现文化跨越的首功之臣；同它们在本国本民族一样，在它们成为他者文化中的经典的蜕变中，那些具有权威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时，教育在经典的传承过程中意义重大，而经典所具有的丰富性、创造性和可读的无限性，则需要通过无数读者的阅读和判断得以验证。因而，当我们探讨文学经典在国外的命运时，也会把目光紧紧盯在译者、阐释者、教育者和阅读者四者身上。这四者的身份有时交叉，有时重合，即有时译者兼为阐释者，译者、阐释者、教育者，同时必然是阅读者，只不过他们的阅读感受通过媒体或著述传播具有比一般读者更为强大的影响罢了。总之，同它们在本国一样，只有当集体的阅读经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变成了集体的无意识时，经典才可以形成。

随着科技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联系到了一起，人际之间的交往、国家之间的来往、观点之间的交流方式较之以往悄然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这种态势，让“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思维显得更为可笑，那些自我陶醉的虚谈也显得更为苍白无力。传播者要让本土经典走向世界，仅仅让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见识走向世界还是很不够的，还要让自己的本领走向世界。在文化冲撞之中，

没有喊出来的精彩，只有走出来的精彩。

二 传播与翻译的语境与“字境”

词源学上，传播具有信息分享和传递这两方面含义，就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传播是个人和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它个人和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表情。一般说来，传播是由传播者、媒介（信道）、内容（信息）、受众以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效果、传播发生的场合、信息所涉及的一系列事件组构而成，也就是传播学上著名的“5W”所概括的传播模式——传播者（Who）、内容（Says What）、媒介（In Which Channel）、受众（To Whom）、效果（With What Effects）——在一定“环境”中的传播是一个流动过程，因此它呈现着动态且复杂的特征。^①由此划分了传播理论研究的五个方面：控制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内容分析、效果分析。当我们在突破了这种理论的单线模式，将回馈问题和传播中的噪音问题也考虑在内的时候，对传播的研究就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

在不同文化传播的流动过程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国文学在日本被翻译和解读的形态来分析，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汉文直读期、文言训读期和白话口语期。

奈良时代以前日本人如何阅读和翻译中国典籍的，文献无考，但活跃于日本朝野归化人的存在，表明已经存在各种形式的口译和笔译活动。在中国典籍进入日本文化的早期，根据文献分析，日本人很可能是采用直接阅读汉文的方法来读解中国典籍的，《万叶集》时代使用的万叶假名采用了以汉字记音来记录日本和歌的办法，可以推测当时对中国典籍是采用按照中国读音（尽管可能已经在转读过程中发生了音变）的方法，日本人不仅由此开始具有了阅读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进而发明了一字记录日语一音的独特技法。《古事记》序中所说的“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亦于姓

^① [英] 邓尼斯·麦奎尔、[瑞典] 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日下，谓玖沙河；于名带字，谓多罗斯。如此之类，随本不改。”^① 这里谈到的是《古事记》写作中的文字问题，从当时日本仅仅存在汉字典籍的情况来推断，也可以推测这些是从阅读汉文典籍中总结和发展出来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难看出后来风靡千年的训读的萌芽。

上述方法已经包含着丰富的翻译学内容，但仍不免繁难。从奈良时代流传的《游仙窟》读法神授和《文选》读法鬼授的传说，可以想见汉文阅读翻译之难。直到平安时代训读法成型，日本的读书人才找到打开汉籍阅读翻译大门的金钥匙。这把钥匙，通过对汉文文法的分析，将文法简单化，对汉语中没有语法明确标识的词语关系，用日语的助词明确起来，大大简化了理解原文仅靠语序难以理清的内部关联，并通过颠倒词序的技巧，极大简化了译解的过程。训读将汉语文言的阅读程序化，创造了直接借用汉字文化的途径，将两种文化的沟通，变成了汉字内部的翻译活动。训读在一千多年的日本汉字教育、文化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引渡、吸附、消纳作用。假名的创制和训读法的普及，在保留原文文本全貌的前提下，解决了将孤立语的汉语一步转换成黏着语的日语的复杂问题，具有文法简略、音声单纯、应变力强的特点，读者经过一定训练，就可自行将未经文字转换的源语文本大体直接读通，这可以说是对“原装”文本的接受。诚如日本学者市来津由彦在谈到前近代日本的中国古典传播与消化时所指出的那样：“读解中国古典，发挥着面向当时的现代表述有关政治与伦理的思想的功能。江户时期提供了政治理念与儒家价值观的这种功能，甚至起到了建构制度的作用，这虽与中国并非完全相同，但基本上是类似的，在翻译文言文化的世界中特许的训读，这种翻译技法，不单是为了阅读，还对将日文思考引导向汉文标记作文方面发挥了作用。”^②

尽管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将中国典籍用日语口语说解的“国字译”、“谚解”和白话小说中的口语附注等将文言文或白话作品转换为日语的尝试，但这些终究是训读的补充手段。训读不仅在传播中国经典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就是在延续日本学人的汉字感情方面，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训读毕竟是用一把钥匙去开中国典籍的万把锁，对于中国经典接受来说，

① [日] 倉野憲司、武田祐吉校注『古事記 祝詞』、岩波書店 1982 年版、第 46—48 頁。

② [日] 市来津由彦『中国思想古典の文化象徴性と明治・大正・昭和』、中村春作、市来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統訓読論』、勉誠社 2010 年版、第 409 頁。

功也训读，罪也训读。明治时期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翻译理论，缓慢地影响到中国典籍的翻译，新的翻译浪潮很难立即动摇延续千数百年的训读传统，虽然有森鸥外等少量以当代日语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尝试，但恋旧的汉学者不忍割舍对汉语文言文特殊韵味的喜好和对训读的依恋，《国译汉文大系》中训读依然是译读汉籍最有效的手段。首先呼吁改变这种状态的是那些与中国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学者。宫原民平（1884—1944）在《由岛国观照到大陆观照》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汉学者，不去研究现代中国的文章，一味徘徊于历史废墟，现代日本汉学教育者则做着浅薄颠倒的违背常识的模仿，而在中国现代语言方面，连一点儿打招呼的话也不会说，一封信也不会写，反而在那里大谈苏东坡怎么样，韩退之怎么样，以此来理解现代中国和中国人什么的，真是太自我了：“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支那研究像要拉开架势凑趣上路，就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他本人就是“试着做支那人，与支那人一起生活，与他们一起住、吃饭、干事、睡觉，时而争吵，时而亲近，来把他们的日常生活看个通透”。（《支那研究的一方面》）^①较长时间在中国生活过的星野苏山、井上红梅（1881—1949）、宫原民平等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开始将中国的古典作品和现代小说翻译成近代日语。由设在上海的日本人出版社“至诚堂”刊行。加之一些受到理雅各、庞德、韦利等中国古典翻译影响的研究者的参与，中国作品的现代日语翻译逐渐成为风气。与此同时，传统的训读也在文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保持着活力。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由全员面对古典，转向建立起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队伍，战后不仅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平行推进，而且形成了研究者兼作翻译者的翻译队伍。

继承了前近代至近代的传统做法，又顺应现代出版业和媒体发展的需要，日本的中国文学经典大体形成了三种体式，也可以说构建了三个系统，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经典传播所独有的体式和系统，也可以说是日本本土经典现代传播方式的复制和改装。这三种方式是：

念及公众的文献整理体。这类著述主要面向学术界，多采用原文照录、训读随后、词语注释、现代语翻译的方式，注释中不能详说的考证内容，则以补说的形式附在原文后，或者书籍前一部分，以训读翻译为主，后一部分

^①〔日〕勝山稔「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翻訳文体について——「三言」の事例を中心に」、中村春作、市来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統訓読論』，勉誠社2010年版、第360頁。

则附以原文，语词等各类索引和参考文献也必不可少。为让经典吸引青年研究者，在译文和注释等方面往往化难为易。

直接诉诸公众的现代翻译体。作品转换为流畅的现代日语，简化注释，不出原文，以序跋、解说对作者、作品作简单介绍和评论。

面向不谙经典的一般读者的改写体。采用翻案、超译、自由译等方式或漫画、戏剧等形式对原作加以改写，使用时尚表述对原作有较大改动。虽然改写的形式不断变化，但这些改写在不同时期内为日本文学的演进吹入外来的新风，却是一以贯之的。从《日本书纪》中改写的《汉书》故事，直到现代小说中的“文艺中国”，这类作品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国文学观。

日本的中国经典传播，用的是这“三条腿”。这三条腿各有自己的读者群。随着汉字水平的降低，网络媒体对读者群的分离以及消费文化的鼎盛，这三条腿中后两条腿越做越粗，而前一条腿却相对细小。但虽然世风多变，学界震荡，毕竟有一批学者还在坚守。

今天，日本的中国文学翻译早已结束了蹒跚学步的阶段，不仅古代经典有了多种口语的名译，而且当代小说也不乏既快且佳的译品，但是日本译者并没有丢弃训读的工具。一方面是口语的盛行，一方面是训读辅之以白话散文语体的解说，中国文学始终由这三种形态传播与流通。这正是百年来日本传播和翻译中国文学特有的多轨并行的特色，而中国方面还缺少前一条腿，第三条腿更为无力。不论是出于提高研究水平的目标，还是培养研究——翻译型学者的需要，加强这两条腿都是十分必要的。

比较文学研究大家凡·保罗（Van Tieghem Paul，1871—1948）曾说：“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学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研究在大部分比较文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前提。”^① 岛田谨二在《翻译文学》（1951）中也说：“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大观，现代文学不正是日本人将欧洲文艺的特征化为己物挣扎苦斗的历史吗？”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国文学不断交流、交融与交响，积累了丰富的翻译文献，这正是近年来兴起的译介研究的基础。然而，与汉语——英语间的翻译研究相比，汉日语之间的文学翻译研究却显

①〔日〕现代日本文学大系74『中岛健藏 中野好夫 河盛好藏 桑原武夫集』，筑摩书房1972年版。

得相当落寞。

诚如加藤周一所说,“在东北亚,即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国内外,古典中国语的诗文曾作为一种国际语起作用。当时的状态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很相似。再加上中文中的很多词汇,即其表意文字作为中介组合到日语中去,有的词汇通过日语训读法,甚至对一部分日语文法的表现也带来了影响。正是以这样的情况为前提,才使直接训读法的日语训读法变为可能”^①。除少数学习过汉语的日本人之外,日本学人不仅阅读,而且翻译也是以日语训读直译法为主。汉语在东亚地域的国际性,是构成中日翻译文化语境的根本因素。这种影响通过汉字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对中日之间的文化翻译研究,不仅要深入到两国语言,而且要深入到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才能道破其在世界翻译史上的独特意义。

一般的看法可能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翻译,那主要是外国人的研究课题,至于谈到日本,很多中国文学作品都已经译成日语,而且译得很好,那就更不用我们“费心”了。然而,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如何将中国文学经典推向世界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而做好这一工作,就必须研究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和译介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中的经验,学习相关的理论。日本历代学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是怎样做的,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来做,都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努力的。中国学人为推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不应应对相关的现象一无所知,也不能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应该知其然与所以然。

近年,我国学术界多借用语言学中“语境”的概念,来描述话语的环境。一般习惯于将“语境”一词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语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言语环境;后者是指言语表达时的具体环境(既可指具体场合、也可指社会环境)。对于两国之间文学经典的传播和研究来说,我们不妨也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影响传播和翻译的诸多背景和参与因素。然而,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由于具有文字的共有项,传播和翻译都不能离开汉字各自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字政策、文字演进和文字相关相涉的不同情

^①〔日〕加藤周一:《文学和翻译》,加藤周一著、彭佳红译:《21世纪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1页。

况。为了更精准地描述传播和翻译的情境，也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传播和翻译的水平，我们可以更多关注两国的“字境”。鉴于此，本书在第三部分，用了较大篇幅来讨论《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古典名著汉译的文字问题，论述了翻译者的文字学修养的重要性。

加藤周一说：“翻译是理解异文化的过程。异文化与自我的距离，是空间或是时间的场合，翻译随之成为共时的或历时的，可当其距离是时空双方的场合，翻译就成为共时的以及历时的。”^①中日双方的古典传播，在彼此之间，既存在着时间上的距离，也存在着空间的距离，我们必须相互克服双重的距离。

本书以较大的篇幅研究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翻译，这既是因为日本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丰厚的积累，也还因为我国学者对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较少且不够系统，而这一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课题，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希望自己的文学遗产能够成为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无不希望本国文学遗产迅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与接纳，20世纪后半期，日本先于中国开始注重将本国名著翻译成各国语言的工作。然而，这一工作绝不是有了推销的意愿、资金投入和官方的运作就可以立即奏效的，而是需要各方协同，长期努力。从学术层面来讲，对于两国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对于不同国家文学传播和翻译规律及运作规则、实施现状的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自说自话”不等于真实的沟通和理解。

说到底，不论是将中国文学译成日语在日本传播，还是将日本文学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都可以看做我们事业的两个方面。同时，做好这两件事，虽然各有自己必要的学问，但也有极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离不开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科学把握。本书采用的是“互读”的方法和立场。

加藤周一说：“理解异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就是把这个概念容纳到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去，在那里定位，并和它的概念加强关系，也就是说对一个事物的理解，不单是把新的要素附加到自己的世界观去就行了，而是怎样把新的要素组合到体系中去的问题。这体系一般是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之中，至少在大致上，是一种既存概念的框架、翻译就是

^①〔日〕加藤周一：《文学和翻译》，加藤周一著、彭佳红译：《21世纪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2页。

把异文化的，即其它的概念框架中的特定概念，拿到自己的框架中来重新下定义。”^① 不论是一词一句的处理，还是整部作品风格的再现，都是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和将其付诸呈现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和操控又无不与译者对原有文本在本土文化中的定位相关。定位的方式不止一种，主要有填补定位、归属定位、对应定位、比况定位等等。

填补定位，即原文本乃是本国文化中所缺失的部分。如日本文明早期，众多概念和文学形式直接从中国典籍引进而新建。这种定位，一度产生了合盘吸纳的翻译策略。

归属定位，即对原文本性质的认知。如周作人、钟敬文对日本古典俳句采用白话翻译，是出于对俳句俗文学性质的判定，而另外一些译者对其用古典语来翻译则出于另一种判定。这种归属的判断，往往决定译者对原文本采用何种翻译态度。批判性翻译往往出于对原文本的负面认知。

对应定位，即将原文本与本国文化的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文体对应。如李芒等人认为《万叶集》产生于我国唐代同一时期，即设定以唐诗体式与风格来翻译它，同样，杨烈认为它主要接受了六朝诗歌的影响，便用那时盛行的五言诗去翻译。

比况式定位，即将原文本视同本国某类作品。如中国早期译者多将《万叶集》说成是“日本的《诗经》”，把《源氏物语》说成是“日本的《红楼梦》”，并在译作中袭用相近的表现手法。

当然，对于原文本来说，这种定位既不是“一次性用品”，也不会“一译定终生”，而是伴随着重译本生产有所变化的、传播和翻译研究不仅要考察和描述这种定位和转换的历史，而且在有条件的时候还要对其做出反思。

三 中日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的“互读”

“中国文学经典在日本的传播和翻译”和“日本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和翻译”，由于有着不同的内容，习惯上会作为两个课题分别研究，这里放在一起，希望以“互读”的视点，来谋求扩大对经典的共识和传播，探讨翻译

^① [日] 加藤周一：《文学和翻译》，加藤周一著、彭佳红译：《21 世纪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22 页。

的历史遗产和现实性问题。

文学经典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研究之所以需要一个“互读”的视角，首先是因为传播与翻译的对象与运作策略的选择都关涉两种文学在比较中显现的不同特性。在谈到日本对中国文化及文学接受问题的时候，井波律子说：“从《怀风藻》《万叶集》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文化以强劲的咀嚼力不断接受中国文化，但是这种接受绝不是无限定的，而是常常伴随着自己的志向相契合、或是选择甄别、或是加以转化的操作，这种与中国文化这种异文化持续相互面对的经验，在明治以来面对西方文化这一新的异文化的时候，可以说是发挥了巨大的有效性。”^①虽然具体圈定哪些是在日本流传的中国文学经典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至少以下的事实反映了这种“咀嚼力”与中国本土对这一问题看法的差异：在《日本书纪》中特别记载的是《论语》与《千字文》东传的传说，在《怀风藻》中最突出显现的是六朝诗歌、初唐应诏诗、应制诗的影响，《枕草子》中提到的“文”是《文选》《白氏文集》和博士所作的申文，江户时代最流行的中国白话小说是“三言”、《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在教育中享有地位的是《蒙求》《三体诗》《古文真宝》……同样，尽管中国对日本古典文学经典的翻译没有这样漫长的历史，但相似的选择性和转换操作也反映到翻译和传播之中：《万叶集》《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收获了多次重译，俳句的翻译和传播培育出了汉俳这一新诗体而显示出比日本俳句更强的抒情性和整体性，同时也有相当多的日本优秀文学遗产还没有翻译并获得传播的机缘。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文学经典进入中国人的阅读鉴赏范围，这种甄别与选择也会继续。不难看出，这些都不过是两种文学不同特性在交流中的突出反映。

文学经典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研究之所以需要一个“互读”的视角，还因为外部传播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日本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传播和翻译，以及中国对日本文学经典的传播和翻译都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转换，其中有许多共同点。20 世纪的文学研究被划分为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领域，但两者无不在各自的一个文化系统中运行，离不开“语境”和“字境”的共有空间。由于译者和学者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接受学术训练，

①〔日〕井波律子「日本人の教養の伝統をめぐる一中国文学、文化受容史」，芳賀徹編『翻訳と日本文化』，精興社 2000 年版，第 37 頁。